

## “全球化、结构变化与工作任务： 新时代的中国劳动力市场”国际研讨会综述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主办,《劳动经济研究》编辑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力资源研究中心承办的“全球化、结构变化与工作任务:新时代的中国劳动力市场”国际研讨会,于2017年12月11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蔡昉,美国斯坦福大学 Scott Rozelle 教授作主旨演讲。与会的国内外学者围绕“新时代的宏观经济趋势”、“新时代的中国劳动力市场”、“教育、技术与人力资本”、“社会保障与和谐劳动力市场”、“创新、技术进步与工作任务”五个议题展开了深入细致的研讨。本次研讨会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问题中外合作研究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科学部应急管理项目的资助。

### 一 新时代的宏观经济趋势

“新时代的宏观经济趋势”是本次研讨会的一个核心议题,与会专家分别从城市化、消费与投资、收入分配、产业结构调整、新旧动能转换、宏观经济政策、对外开放政策等方面展开了讨论,为我们了解中国的宏观经济趋势、发展动力和阻力提供了翔实的经验证据。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本单元的讨论丰富了我们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结构性失衡”的认识。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既要高度重视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中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更要坚定信心,积极地迎接和解决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和阻力,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蔡昉以“要不要以及如何保持城市化进程”为题作主旨演讲。蔡昉指出,中国经济过去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人口的流动、就业的扩大和非农产业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得益于城市化。而当前中国的城市化远未完成,尚有巨大空间。蔡昉提出,稳转移就是稳增长,稳定劳动力转移和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是稳定经济增长的要求。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中,“被城镇化”与“口径城镇化”等由行政区划变动导致的城镇化的贡献是53%。然而,这部分贡献和劳动力资源重新配

置以及生产率提高没有太大的关系。蔡昉认为，就城镇化作为经济增长动力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载体而言，真正有意义的是农民工的进入、居住和就业。然而，近年来，中国农民工增量明显下降，2014年已经出现乏力，这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农民工没有获得与城镇居民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工得到城市户口，得到均等的公共服务，要破除妨碍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推进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存在一些障碍，其中，根本的原因在于改革的红利不能在所有地方均等分配，而改革的成本是每一个地方政府都要负担的。蔡昉提出，要打破这种制度性障碍，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第一，应当明确地方政府的政策底线，不断增强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拉力”，不能形成新的“推力”，否则会对全国造成经济社会负外部性影响。第二，户籍制度的改革、农民工的市民化，是一个具有全国性质的、长治久安性质的公共品，具有正外部性。因此，中央政府应当进行顶层设计并扩大买单范围，与地方政府分担与农民工市民化相关的额外支出，加大中央责任。最后，蔡昉强调，中国的城镇化探索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呈现出下滑趋势，遇到了一些阻力。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根本的阻力是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在产能过剩、产能利用率下降、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杠杆率高、资产泡沫和金融效率低等现象，而这一系列问题的症结在于过度投资。王小鲁指出，投资并不是越多越好，过高和过低的投资率都会劣化资源配置，降低效率。应当高度重视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两个问题：一是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相对不足，收入分配严重不均影响了居民消费；二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受到干扰，企业提高效率和科技创新动力不足。王小鲁认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依赖于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尽管近几年结构再平衡是有进展的，但是距离理想的平衡结构还相差很远。要保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从以下三方面加快改革和结构调整：一是从加杠杆逐渐地转向去杠杆；二是重视投资率过高而消费率过低的现象，从过高投资转向合理投资，从过大的收入差距转向合理的收入差距，改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促进居民消费；三是推进政府改革，减少对市场的干预，降低行政成本。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认为，当前中国经济下滑的趋势与国内消费不足有关。人们常规的思路是，要增加消费，需要降低不平等和收入差距，解决贫困问题。然而，万广华等研究发现，消费与不平等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即减少不平等会带来消费的降低。他指出，消费与不平等之间的这种有违常理的正向关系是由

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引起的，户籍制度和城乡差异不利于消费增长。尤其在农村地区，居民的消费选择余地小、储蓄率高、金融市场不发达。万广华指出，要促进消费，根本上要打破城乡分割，改革和废除户籍制度，这将不仅有利于拉动内需，还有利于减少中国的社会不平等。

“着力振兴实体经济”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指出，中国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名义占比和实际占比均呈现下降趋势。当前中国的工业化尚未完成，应当从规模和效率两方面改造和提升制造业，使其再次成为长期增长的引擎。黄群慧以东亚高收入经济体为例，分析了其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时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两个典型事实。一是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制造业名义增加值占比总体下降，符合经典产业结构理论的预期，但剔除价格因素后，制造业的实际占比在大部分国家是上涨的。二是制造业效率的持续改善并不局限于特定的发展阶段，既发生于已经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日本，也发生于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前后的韩国。东亚经验对中国具有以下启示。首先，应当充分认识到制造业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不仅体现在经济起飞阶段，也适用于中高收入阶段。应当重视制造业的规模经济效益，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动态地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带动下游产业和配套企业的发展。第二，注重制造业效率提升。在传统竞争优势弱化时，及时推动制造业的增长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依靠技术进步推动制造业的升级。

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中，要善于创新，更要善于处旧，妥善平稳地使“旧的”退出，推动和确保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认为，2010年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下滑在本质上是一个结构变迁的问题，过去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产业基础很难继续支持下一轮的经济扩张，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源型重工业分别面临着用工成本提高和产能过剩的挑战。他指出，下一轮的经济扩张需要新的产业，需要新旧动能的转换，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及时、平稳地使“旧的”退出。黄益平强调，未来应当继续推动去产能，重视“僵尸企业”的处置工作，做好人员安置。此外，黄益平强调，尽管中国金融很稳定，但是始终存在系统性风险。以往的几十年，中国金融稳定的背后有两个因素：一是长期高速增长，在发展中化解问题；二是政府的隐形担保，有问题由政府压住。未来应当高度重视和防范金融风险。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晓晶以“扭曲、赶超与可持续增长”为题作了发言。张晓晶指出，所谓“扭曲”是指对最优均衡状态的偏离。存在两

种类型的“扭曲”：一是“内生的扭曲”，是由于市场发育不健全和不成熟造成的“天然扭曲”；另一种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比如超赶或民粹，而进行的“政策扭曲”。张晓晶认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收入相对较低的时候，存在“良性扭曲”。即使在中等收入阶段，经济自由度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也呈现一定的负相关，存在一定的“扭曲”是有好处的。然而，到了高收入阶段，经济自由度越高越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扭曲”的负面作用越大。这对于正在迈向高收入经济体的中国含义非常明确。张晓晶指出，当前中国的市场化程度是在推进的，中国的“扭曲”程度也在减弱。在未来的发展中，应当明确改革的方向，进一步减少和纠正“扭曲”。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减少“扭曲”绝不是不要政府，政府应当成为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前提和保障，而不是依靠政府削弱和代替市场机制。该研究引发我们进一步思考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发展的新时代，在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领导的前提下，应推进改革，寻找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平衡。

在过去的30~40年中，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制度安排。十九大报告指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张斌等的合作研究，按照是否成功进入高收入阶段，分析和比较了“高收入组”、“成功赶超组”、“失败赶超组”的对外开放政策。他们的研究发现，失败赶超组具有以下特点：首先是贸易上没有高收入组和成功赶超组开放，表现为出口较少、关税和贸易壁垒较高、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低、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更为严格，尤其是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第二，失败赶超组在汇率制度方面害怕浮动，更加倾向于固定汇率制度；第三，失败赶超组在资本项目方面有较多的管制。成功赶超组更像高收入组，具有以下特点：在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上更加开放；更倾向于浮动汇率制度，汇率比较稳定；在资本项目上也比较开放。张斌指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开放政策给中国的启示是，应当拓展对外贸易，在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实行更高水平的自由化和开放政策；尤其是要扩大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政府要更多地发挥服务作用；从中间汇率制度转向浮动汇率制度。此外，还应当加强对知识产权、劳动力和环境的保护。

## 二 新时代的中国劳动力市场

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

动力的攻关期，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效率的提高将更多地依托要素变革和技术进步。这一系列变化都深刻地影响着就业和劳动力市场结构、工作任务与技能需求变化，就业成为新时代最大的民生，宏观经济形势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对劳动者的技能和人力资本水平提出了更为多元化和更高的要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都阳分析了中国企业使用新技术的决定因素和对就业的影响。都阳指出，近年来，由于普通劳动者工资的增加、非技能工人的短缺、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快速增长以及科技进步，“机器换人”成为新的发展趋势。根据国际机器人联盟的数据，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其使用总量占世界机器人使用总量的30.3%，中国机器人使用的扩张速度也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工业机器人主要从事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工作或任务，包括搬运、焊接、组装和拆卸、清洁、涂层等，集中在汽车制造业、3C（计算机、通讯和消费电子产品）行业、金属加工和机械制造业。根据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China Employer-Employee Survey，简称CEES）数据，9%的样本企业使用了机器人，40%的企业使用了数控机床技术。都阳等的合作研究指出，“机器换人”是有一定门槛的，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一是从劳动力市场层面上，受劳动力成本提高、劳动力短缺等劳动力市场变化影响较大的企业，更倾向于使用机器人；二是从企业层面上，大型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生产技术水平较高或具备使用新技术基础的企业会倾向于也更有条件使用工业机器人；三是从政策层面上，享受政府创新补贴或其他优惠政策的企业使用机器人的比例更高。新技术的使用对于就业和劳动力市场有深刻的影响。研究指出，新技术的使用对就业的影响取决于技术与劳动力之间是替代还是互补关系，这与工作任务的性质密切相关。而即使两者之间是替代关系，新技术的使用也有利于就业的增加，因为新技术的发展有利于增加产出、提高生产率和市场占比。

在经济发展的新时代，工作任务与技能需求将有一些新的变化和发展趋势。根据David Autor等学者提出的工作任务分析法，工作任务包括以下五种类型：非常规认知型的分析型任务、非常规认知型的互动型任务、常规认知型任务、常规操作型任务、非常规操作型任务。依据工作任务的复杂性和对技能的需求，这些任务被划分为高技能岗位（非常规认知型的分析型任务、非常规认知型的互动型任务）、中等技能岗位（常规认知型任务、常规操作型任务）和低技能岗位（非常规操作型任务）。根据世界银行《2016年世界发展报告》，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中等技能工作岗位减少、高技能和低技能工作岗位增加，劳动力市场呈现出“两极化”趋势。这既发生在美国、西

欧等高收入经济体，也出现在一些中等和低收入经济体。而在中国，中等技能工作岗位近年来却呈现出明显的增加趋势。

来自香港科技大学的 Albert Park 教授研究了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需求的变化，他从全球化、科技进步和经济结构三个角度进行了分析。基于对 CEES、中国人口普查数据（2000 - 2015 年）和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China Urban Labor Survey, 简称 CULS）数据的研究，Albert Park 发现，从 2000 年至 2015 年，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中，高技能岗位（包括高级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办公室人员）和低技能岗位（一线工人）占比均下降，中等技能岗位（服务业和零售业员工）的占比上升。Albert Park 指出，2000 - 2015 年，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需求的变化主要受以下三个因素的影响。一是产业结构的变化，尤其是服务业占比的增加促使常规认知型、常规操作型的中等技能工作岗位增加。其中，一些服务业比如金融服务部门的发展，对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二是全球化和外国资本的进入，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加工型企业对于非常规分析型和互动型的工作需求较低，而对于常规操作型工作需求较高，这两类企业主要雇佣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操作型工人，较少雇佣高级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性人员。三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生产率的提高，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型企业会越来越少。未来，中国劳动力市场将更有可能遵循世界范式，对非常规分析型和互动型任务有更高的需求，对于常规型任务的需求会相对减少。

波兰结构研究院的 Piotr Lewandowski 使用 CULS、世界银行“面向就业和生产率的技能”（Skills Toward Employment and Productivity, 简称 STEP）调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开展实施的“国际成人能力评估调查”（Programme for the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of Adult Competencies, 简称 PIAAC）数据，分析了全球常规型与非常规型工作的分布和变化趋势。Piotr Lewandowski 等的合作研究发现，美国和西欧劳动力市场中，工作任务呈现出“去常规化”的趋势，这主要是由于科技进步使一些常规型的工作任务由自动化技术或机器人执行；非常规认知型和互动型的工作任务是自动化技术、机器人或相关科技产品无法替代的，因此，其占比呈现出增长的趋势；非常规操作型任务占比有所回升，主要包括一些较为复杂的和体力消耗型的工作任务。在发达国家和地区，非常规型工作更为普遍，越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从事非常规型工作任务的劳动者越多，其价值和工资回报也越高；而高技能的、非常规型工作任务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相对较少。Piotr Lewandowski 提出使用“常规型任务强度指数”（Routine Task Intensity）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研究发现，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常规型任务强度指数差异的一半可以被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技能和就业结构等因素解释。该

研究发现,从事常规型任务的多为女性、年轻人、中等教育及以下群体,这些劳动者在工作中不使用计算机的占比较大,识字或读写技能较低,集中分布在批发和零售业、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交通运输业、仓储业、住宿和餐饮业等低技能行业。

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程虹介绍了 CEES 的进展和一些初步的调查结果。程虹论述了当前中国制造业企业和劳动力市场发展的几个趋势。首先,在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和员工离职率居高不下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企业正在努力寻找应对方法,例如使用自动化设备和工业机器人;第二,劳动者的技能正在提高,人力资本投入在增加;第三,企业研发投入在增长,国有企业、出口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在研发投入方面有更大的优势;第四,政府开始偏重于创新的发展政策,包括通过补贴等手段促进企业发展。当前,中国的制造业发展仍然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企业平均利润率下降明显,调查显示,有近 20% 的企业利润为负;用工仍然是制约制造业企业发展的一个主要挑战,部分企业由于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和工人的离职率高,退出市场或减少劳动力的使用;从工作任务来看,58% 的员工从事的都是简单重复性的工作;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投入增长乏力,并且较为依赖政府的补贴。

### 三 教育、技术与人力资本

中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新旧增长动能的转换需要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应当高度重视人力资本投资,积极适应新时代中国的宏观经济趋势和劳动力市场的技能需求变化。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国在普及义务教育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然而,中国的人力资本发展,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未来应该更加重视对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

从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率来看,越早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和回报率越高。根据 James Heckman 提出的人力资本阶段理论,人力资本的投资回报率在婴幼儿早期阶段、学前阶段、在学阶段和毕业后阶段,逐步递减。因此,早期人力资本投资应当引起更多的关注。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的 Scott Rozelle 教授,从早期人力资本发展的视角,就中国人力资本的发展状况和面临的挑战作主旨演讲。Scott Rozelle 认为,中国现阶段整体人力资本水平仍然较低,而中国的低人力资本水平在本质上是农村问题,其根源在于农村地区的早期人力资本发展状况不容乐观,婴幼儿时期儿童认知能力低下的状况较为普遍。Scott Rozelle 的研究团队运用随机干预实验的方法,研究了营养和养育行为

对儿童早期智力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营养、健康状况和养育行为对农村地区婴幼儿的认知能力均具有一定的影响。在其研究中，通过给儿童分发维生素、眼镜和除虫药，可以有效地改善儿童的营养和健康状况，提高他们的学习成绩；科学合理的养育行为有利于儿童的成长和早期智力发展。当前中国农村地区留守儿童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照料和养育缺失以及给智力发育带来的负面影响。基于这些研究发现，Scott Rozelle 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为了适应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形势和社会转型，应当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尤其应当采取干预措施来改善中国农村地区的早期人力资本状况，加大对3岁及以下儿童的人力资本投资，关注其营养状况并给予科学合理的养育。

中国科学院的张林秀和北京大学刘承芳的合作研究发现，在过去的40年，中国农村劳动力转向非农就业的比例稳定地增长，这与劳动力的乡城迁移密切相关；分行业看，更多的年轻人从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年轻劳动者几乎完全完成了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的转移，未来36~50岁的农业劳动者是向非农就业转移的潜力群体。研究指出，教育对促进非农就业、工资增长和职业向上流动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教育的回报率来看，2004-2015年，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工资均在上涨。其中，高等教育的回报是最高的，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劳动者工资上升趋势最明显；高中及以下的劳动者工资率趋同，其教育的回报正在降低或逐步消失。未来要继续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高度重视农村教育，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并注重高等教育的发展。此外，伴随着低龄劳动者基本完成了向非农就业部门的转移，未来应重视成年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积累，为非农就业的发展提供新动力。

亚洲开发银行中国知识共享平台主任 Niny Khor 指出，中国的劳动力生产率仍然较低，有较大的增长潜力。从平均受教育年限来看，中国低于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Niny Khor 指出，很多中等收入经济体在进入高收入阶段之前，已经实现了高中教育的普及，如果中国到2020年前实现高收入，到时候中国将是唯一的例外。Niny Khor 认为，两个因素导致中国人力资本发展相对缓慢：一方面，从供给方来看，由于教育的快速发展，特别是职业技术学院的扩招，教育质量值得担忧，而在农村地区这一问题更为明显；另一方面，从需求方看，工资的显著增长和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提高了受教育者的机会成本，这更有可能导致高中辍学率的提高。Niny Khor 提出三条改善人力资本的政策建议：首先，应当关注城乡人力资本差距，降低城乡之间人力资本不平等；第二，应当改善农村和农民工子女的人力资本水平，推动其在教育和健康方面的人力资本积累；第三，不仅要关注年轻人，还要努力创建一个系统或者制度，重视对成年劳动者的教育和培训，投入更多的资金对他们进行再培训。



除了教育,在工作中的学习和培训也是实现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来自中央财经大学和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的李海峥,分析了劳动者在工作岗位中的学习是如何影响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积累的,尤其是在提高劳动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方面。李海峥等的合作研究,使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PIAAC数据,提出衡量工作任务复杂性的三个指标,包括“一般型任务的复杂性”、“互动型任务的复杂性”、“分析型任务的复杂性”。衡量的内容包括两个层面:是不是经常地完成这样的工作任务以及完成过多少这样的工作任务。该研究指出,不能把“工作任务”本身看作“技能”,这两者还是有差别的,有一个转换的过程,两者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一般型任务”在提高劳动者的问题解决型技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二,“分析型任务”有助于劳动者问题解决型技能的积累;第三,“互动型任务”对问题解决型技能的积累并没有显著影响;最后,工作任务的复杂性越高,越有助于提高劳动者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

#### 四 社会保障与和谐劳动力市场

推动非正规就业转向正规就业对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加充分就业的目标至关重要。国际劳工组织就业政策司非正规经济部主任Frédéric Lapeyre讨论了全球范围内非正规就业的情况,并提出了一些改善非正规就业的政策建议,对中国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非正规就业”既包括在未登记的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就业,也包括在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和家庭帮工。以这一定义来界定非正规就业,Frédéric Lapeyre介绍到,全球范围内非正规就业占比为50.5%(不含农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及新兴经济体的非正规就业占比为59.5%,而发达国家和地区仅为17.1%。Frédéric Lapeyre的研究发现,非正规就业占比与受教育水平负相关,受教育水平越低的群体非正规就业的占比越高,这适用于绝大多数地区、行业 and 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因此,发展教育事业并提高教育质量能够促进就业正规化。正规就业占比与年龄呈倒U型相关性,随着年龄增长正规就业占比提高,其中,15~24岁的群体较难找到工作,随后是一个大的跃升,在30~54岁的群体中正规就业的比例最高,随后下降。因此需要加强对年轻人非正规就业情况的关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有益于向正规就业转变,而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一定的情况下,非正规就业的情况也有较大差异,主要是由各国劳动力市场政策的不同带来的。因此,经济发展的质量很重要,高质量的增长会促进非正规就业下降。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 Jane Golley 等的合作研究，从“个人境遇”和“努力”两个角度分析性别不平等，并从性别视角分析了中国劳动力收入的机会不平等。根据 2010 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该研究发现，父亲的受教育状况和职业、出生时的户籍状况和出生地等个人境遇影响女性的收入；而个人“努力”（体现在教育、职业、共产党员身份、迁移状态、婚姻状态等变量）的程度也受境遇影响，进而影响个人的劳动收入。在职位和劳动力收入分配方面，“个人境遇”对女性的影响比对男性的影响更为显著，女性的收入、教育和职业选择更多地受其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状况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劳动力收入的机会不平等在全世界是较为突出的，应当引起更多的关注。一方面，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较为显著；另一方面，受个人境遇和努力程度的影响，女性之间的机会不平等和差异十分显著。为改善这种情况，该研究强调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注重构建有利于性别平等的舆论环境，中国现有的政策和社会舆论环境中体现了对女性生产、再生产和照料等多重角色的期待和冲突。例如，寻找“最美家庭”和传统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前者体现了期待女性履行相夫教子和家务劳动、秉承“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而后者体现了社会对女性参与经济活动的期待，期待其在生产领域发挥与男性同等的作用。第二，应当重新审视和理解“二孩政策”，因为“二孩政策”可能导致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歧视。第三，基于个人境遇的重要性，应当重视对特殊群体的教育资助，包括对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的女孩、农村以及父亲受教育水平低的女孩的资助。

密西根大学的 Yujeong Yang 等的合作研究，分析了中国制造业从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转移的趋势及对中国发展模式与工作条件变化的影响。研究指出，由于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依靠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发展的模式正在改变，资本和生产转移到内陆省份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该研究认为，这种转移带来中国内陆省份就业的本土化趋势，而由于内陆地区将更多地依靠当地和临近地区工人来满足其产业转型，地方政府的治理模式会更倾向于包容性的社会政策，并注重改善工作条件。该研究引发我们思考中国的产业地区转移对内陆地区经济发展、就业、劳动关系以及微观层面上对个人和家庭带来的影响，就业本土化对解决农村地区留守老人和儿童问题，都有深远的影响，相关问题值得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近年来，企业负担重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一个重要的挑战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其中，社会保险成本作为劳动力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程杰指出，从政策层面看，企业的社会保险缴费比例较高；然而，无论是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还是从 CEES 数据来看，企业实际的社会保

险负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仅占工资的16%~17%。程杰等的合作研究发现,中国的社会保险制度在执行上处于相对分割状态,不同城市和企业之间的实际缴费比例差异较大,受城市层面执行力、企业层面执行力和最后的实际执行力的影响。在城市层面,地方政府在执行上有一定的政策弹性和自主性,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调整地方费率,城市层面上的执行力主要受地方经济社会条件、人口结构和迁移人口占比的影响;在企业层面,同一个城市的企业由于规模大小、所有制差异、是否坐落在开发区、是劳动密集型还是资本密集型以及是否享受相关优惠政策等因素,形成了企业层面上执行力的差异;在实际执行层面,即使在同样的政策环境下,对同一种类型的企业而言,在实际执行层面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该研究强调,社会保险政策的执行与就业和生产率增长相关,这表现在,更强的执行环境尤其是城市层面更高的名义费率,会通过需求方降低就业,不利于就业的增长,尤其对一线操作型工人的就业增长不利;而在生产率方面,与预期不同的是,很强的城市层面的政策环境似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比较关键的,这一点未来也需要更多的研究。

来自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的程欣,讨论了企业实际社会保障缴费率低于名义缴费率的情况。程欣指出,如果按劳动者工资40%的标准进行征缴,从企业层面看,可能会存在尽可能压低企业成本、降低企业社保缴费率的情况,或者仅以底薪或基本工资为标准进行社保征缴;从劳动者层面看,一些年轻的劳动者或者农村的务工者可能会倾向于不缴纳社保而将这部分社保拿到自己手中。程欣指出,基于CEES数据,中国企业社保成本占工资成本的比例在16%左右;社保成本偏低的企业主要是民营、外资、中国港澳台和出口贸易型企业;劳动密集型、工资成本偏高型、增速偏快的企业,社保成本也偏低;此外,有工会的企业,社保缴费率略高。

## 五 创新、技术进步与工作任务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分析了在中国大学扩招背景下的人力资本与内生技术进步。冯帅章等研究发现,内生性的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改变了对大学毕业生的相对需求。研究指出,企业使用新技术的情况受当地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影响,大学毕业生供给的增加激励了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高技能型企业更多地积累资金、投资研究与开发;不同城市间的高校招生差异构成了供给冲击,在大学扩招力度较大的城市,会有更多新企业进入到高技能行业;如果没有对劳动力流动的约束和限制,大学扩招的影响会更大。该研究讨论了城市层面的内生性:一方面,大学毕业生倾向于迁移到有更高

劳动力需求的城市，高技能劳动力占比高的城市在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当更多的企业进入到高技能占比高的城市，城市会有一些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政策，不利于新工人进入城市。此外，其他的政策变化也带来一定的影响，如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高技能行业更少地得到了相关关税的保护、国有企业改革、户籍制度对劳动力完全自由流动的限制。该研究指出，技能偏向型技术变革是全球范围内高等教育占比增加的一个结果，这一趋势将持续；高等教育劳动者的供给冲击有利于技术进步和中国经济增长。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屈小博等，使用 CEES 数据，分析了自动化技术和机器人的使用对中国的工资水平和工资不平等的影响。研究指出，自动化技术和机器人的使用带来整体性的工资增长，但与此同时，也扩大了企业内部的工资不平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从受教育水平上看，学历越高的群体所获得的工资回报越高，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劳动者在企业使用自动化和机器人的时候会获得更高的工资；从分工上看，自动化技术和机器人的使用显著提高了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而对操作型工人却有负向冲击；从技能回报上看，自动化技术和机器人的使用对认知型、互动型技能的员工有正向影响，尤其体现在奖金方面，而对低技能的操作型工人的工资回报有负向影响，这是由于从事非常规的认知型和互动型任务的劳动者受自动化的影响较小，两者是互补的关系，而后者是替代关系。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贾朋等的合作研究，分析了工作中计算机的使用情况及对生产率的影响。从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来看，在参与调查的 6 个城市中，57% 的劳动者在工作中使用计算机。研究指出，作为科技进步的代理变量，使用计算机和其他与计算机相关的技术能提升个人的劳动生产率。如果不控制其他可能影响工资的因素，使用计算机和不使用计算机的工资差异在 60% 左右。如果控制其他个体特征、人力资本特征、企业特征以及城市虚拟变量之后，这一差异下降到 23% 左右。该研究认为，工作任务的安排影响使用计算机的回报，大部分人使用计算机主要是做一些简单的工作，例如收发邮件、在互联网上搜索信息，只有 14% 的人做数据管理，极少数的人做软件的开发和编程（约 5%）。因此，使用计算机的回报被工作任务的安排弱化，而控制了工作任务变量以后，使用计算机的回报下降到 14% 左右。最后，该研究提出，使用计算机完成更复杂的任务，尤其是当计算机与其他技术结合的时候，回报会更高；要促使人们的工作任务从常规型向非常规型转变，从使用简单的计算机功能向复杂的计算机功能转变，以此获得更高的回报。

（执笔人：王永浩）